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唐勤 版式:吉学莉
企業家日報 ENTREPRENEURS' DAILY

(紧接A1版)

双循环视域下的三驾马车发展方向

资金调节功能便能更好发挥。不同人口结构区域间的调剂功能提升上来后，辽宁和东北等地的养老金发放难题，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互济”功能加以解决。过去其中的行政阻力较大，相关部门形成了庞大管理队伍，手握实权管理收缴费用，这样就为自身带来了部门的既得利益。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将该系统所有的收费管理功能、交给税收工作系统，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阻碍因素，应乘势加快落实已提出了十余年的全国统筹改革目标。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社会统筹，全国便可形成一个统一的缴费比例，十分有利于劳动力无壁垒地在统一市场流动，而且同时可以通过精算分析，得知全国蓄水池功能提升后，缴费率可以下调的量值，这样一来就有条件来降低企业相关的缴费负担。

（二）投资的堵点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于具有投资规划权的部门缺少协调。多个部门都有实际的规划权和对投资安排的重要影响力，如何“多规合一”地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带出建设项目投资高水平的通盘安排，便是消除投资堵点的一大关键所在。在一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过去的职能分工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信部门负责企业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规划，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乡建设开发规划，另外交通有规划，环保有规划，教育有规划，如此这般。但这些规划间怎样有机地、合理地联结在一个全景图里，怎样在整个国土开发过程中高水平地形成整个一盘棋似的合理结构？落到结构上，便是供给管理问题，但是前面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应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那就是以制度和规划的改革消除需求侧堵点、使投资需求能够有条件合理而充分地表现、畅通地对接供给。

表4 2012–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年 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12	374695	20.3	223982	24.8
2013	446294	19.1	274794	23.1
2014	512021	15.2	321576	18.1
2015	562000	9.8	354007	10.1
2016	606466	7.9	365219	3.2
2017	641238	7.0	381510	6.0
2018	645675	5.9	394051	8.7
2019	560874	5.1	311159	4.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如表4所示，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度增幅明显降低，其中占有3/5左右比重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016年急剧下降，在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多个文件给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吃“定心丸”之后，2017–2018年间有所回升，2019年再次走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民间投资从两位数的快速增长降低到个位数增长，特别是民间投资的低速不振，背后固然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等的调整发生作用的因素，以及预算内投资资金增幅下降因素(见表5)，但同时也无可讳言，与近年影响甚巨的“民企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民企)”论等的不良效应，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民企决策倾向于海外投资的不惜工本而调低国内投资安排，并且投资行为在“脚踩两条船”的考虑下趋于短期化，这就主要是来自投资和运营大环境方面提供的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不足的问题了。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加强产权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措施续给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培养和引导其长期行为，就成为需求侧改革的重大相关命题。

表5 2010–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国家预算内资金

年 份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10	13104.67	14.0
2011	14843.29	13.3
2012	18958.66	27.7
2013	22305.26	17.7
2014	26745.42	20.0
2015	30924.28	15.6
2016	36211.67	17.1
2017	38741.71	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出口的堵点

外贸进出口中形成的净出口，被人们称为“三驾马车”之一，是需求侧的重要变量和“外循环”方面的关键性指标。从总体上看，我国外贸已经较大程度放开，消除其堵点在于，政府能否更好地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提供及时的服务、引导；在有关的行业协会等方面，能否更好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等等。由于新冠疫情在我国率先得到基本控制的特殊背景，2020年我国“三驾马车”中，出口远超预期，中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估计全年上升为历史上罕见的16%左右，这是二战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大国达到过的高出口比例。因为国内疫情的控制成效显著，使我国率先恢复产能，回应其他国家疫情攻击下的进口需求，我国于出口上占据了先发优势。但是，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出口产品多样化问题、全球供应链中的定位以及全球贸易大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等问题，仍不可忽视。自美中贸易战以来，市场整体而言对外贸易预期不良，国内市场主体顾虑重重，美方对我国部分重要出口产品提高关税，外贸大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另外，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冲击使各国面临经济下行、失业严重的问题，各国考虑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产能、提升本国就业的激励增大。从近年来我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情况来看，作为制造业大国在货物出口方面仍处于贸易顺差(如表6所示)，而在服务进出口方面处于贸易逆差位置(如表7所示)。注重优化相关制度规则以利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贸易出口能力，是在不确定性迭起的全球情境中消除堵点、稳定和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任务。

表6 2015–2019年货物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货物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差额
2015	245502.9	141166.8	104967.2	36830.7
2016	243386.5	138419.3	104336.1	33452.1
2017	278099.2	153309.4	124789.8	28519.6
2018	305008.1	164127.8	140880.3	23247.5
2019	315627.3	172373.6	143263.7	29119.9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7 2015–2019年服务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服务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进出口差额
2015	6541.6	2186.2	4355.4	−2169.2
2017	6616.3	2095.3	4521.0	−2425.7
2017	6956.8	2280.9	4675.9	−2395.0
2018	7918.8	2668.4	5250.4	−2582.0
2019	7850.0	2836.0	5014.0	−2178.0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进路

（一）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

虽然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阶层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是高低悬殊的。平均数会掩盖很多矛盾。一个亿万富翁的收入，就能把许多一般人的收入水平，平均到百万富翁级别。现在中国仍有6亿人左右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仅在1000元出头。这6亿人的消费能力相当有限，但是社会成员里面不可忽视的相当大的组成部分。从总体而言，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处于中低收入阶层。虽然近年中国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一般认为说也仅仅是14亿人的零头，即有了约4亿中产阶层。除此之外，还有财富在“金字塔尖”的人群——这“先富起来”的人数量约几百万人，在14亿人中比重还相当低，但掌握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却相当高。因此，全面地看，14亿人中约有近10亿低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

消费不足，具体分析中还可指出两个方面。第一是上述分析指出的许多人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无法消费，即消费能力不足。第二则是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不少人虽有一定收入和消费能力、但是有顾虑、不敢消费。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涉及相关制度规则的优化改进。

前文把对于降低百姓的“后顾之忧”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分析论述。如何让百姓提升消费能力即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更应结合相关改革和政策加以重视和解决：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两个切入点。第一是正面鼓励就业、提供更好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业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在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在就业方面多做贡献。今后还需要这样双管齐下，以打造高标准法治营商环境重点鼓励和引导创业创新搞活企业为基础，一是做好从农民工的培训到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技术工人的多种形式的培养工作；二是以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继续给提供80%以上就业岗位和90%以上新增就业机会的民企“吃好定心丸”，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促成充分就业局面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个切入点是优化、强化转移支付。其扶助对象通常为各类弱势群体。最极端的就是病患者、残疾人、独居老人和孤儿等，对这类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抚恤、低保和各类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定津贴与救济的政府转移支付，合在一起，让他们有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消费能力。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而非发达经济体。因此现阶段如套用发达经济体经验数据中的消费占GDP 70%以上，是有盲目性的。但从近年数据看，消费率有所提高，符合中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又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过程的特征。中国到“十四五”末期，有望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是努力的方向，如配之以适当的调动居民消费潜力的制度和政策，我国消费率的提高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不应将这一释放消费潜力问题，理解为当下就要向发达国家的具体数据看齐。

在2020大疫的冲击下，中国的消费率阶段性明显下降，但是2020年在防疫经验、疫苗推广、提高救治率方面的持续进步，又会形成积极信号和推动消费上升的因素。在有效药和护理经验地情况下，新冠病例治愈率提高、死亡率降低，如不出大的意外，2021–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升幅等消费指标，预期会基本接近疫前的正常情况，但努力在改革中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机制与政策，是一项十分关键的要领。

注重以内循环为主体，客观地需要更为注重怎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如前所述，这方面的收入确实是在上升，但不必讳言，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着悬殊过大等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进而更好改进民生，实现更顺畅的内循环。中央已明确指出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针，涉及中国在改革深水区如何“啃硬骨头”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等攻坚克难的任务，已有新进改革成绩的个人所得税，也很有必要在深化其改革中作动态优化。

（二）多策并举消除堵点，积极扩大有效投融资

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是满足消费，但消费可持续的大前提，是形成有效投融资，以此不断形成社会再生产创新发展中的有效供给，满足和引领消费的发展和升级，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为使我国的有效投融资消除堵点进一步释放其潜力，至少有三大要领值得注重：

一是在政府国土开发、通盘投资建设规划上形成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新局面，前已论及，在此不作展开。

二是依照中央对民企“自己人”的定位，高度重视在制度建设、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给民企继续“吃好定心丸”，对此也已有前述的分析，在此也不作展开。

三是要在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上结合中央、国务院已明确的“两新一重”部署，匹配“守正出奇”的政策性金融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对此需略作展开：

2020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两新一重”旨在“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这样，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有效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包括发展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网络，加强已经来临但仍需拓展的5G应用、特高压输变电体系，大力建设充电桩以实现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推广等。新基建是为了支持数字经济转型升级、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关联于新经济发展，当然也要和其他传统的老基建一起配套，来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新基建也势必需要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让更多投资主体的参与形成合力，投融资方式也将更为多元化，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事项中涉及加强县城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县城参加就业以及安家，另外包括对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并发展相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等等。我国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已实施多年，内在要求是从开始的追求速度转向更加追求质量，通过加大投资来弥补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短板来实现民生质量升级。在补短板、调结构、增后劲的努力中，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即传统的“铁公基”、水利、能源工程等，仍然是稳生产、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项目。在大力推动新基建的同时，新基建与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优化属于有重要意义的供给侧改革与管理范畴，但投融资需求的释放如何消除堵点，自然地形成了其前置环节。面对天文数字的投融资建设任务，“两新一重”的实施所需资金、政府的有限财力只能定位于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引子钱”要紧密结合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创新和PPP的规范发展，以财力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特别开发贷款、BOT、TOT、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施连片综合开发等形式，“守正出奇”地形成政府规划与引导、合作之下有限预算资金的乘数放大效应和更高的项目建设绩效水平。

（三）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使城乡间要素流动更为顺畅

中国的现代化从短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是一个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要在配套改革中使要素得到充分流动，首先是要通过产籍改革等形成的制度变革，让更多农村人口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已有明确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居住证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以后有更好的条件与更高的明望值，尽快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图5 2010–2019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如图5所示，2019年底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高达60%，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38%。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距。随着农村人口对个人发展、收入增加等的追求，近些年已有3亿多人从农村到城镇，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拿到户籍，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人群并没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待遇。这背后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设施、软硬件等尚不能满足需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仍有待提升的现状制约。在城镇化进程中，亟待把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对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加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容量，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实实在在真正城镇化的关键指标，进一步地和不断地弥合二元经济，使城乡间要素流动更为顺畅的大环境中，最终使二元经济充分地一元化、现代化。

（四）注重贯通相关环节与优化供应链弹性，推动外贸发展与必要的出口转内销

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意味着轻视外循环，我们仍坚定不移地坚持拥抱经济全球化和积极发展国际多双边贸易体系，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并推进RCEP多边自贸协定，推动全球贸易体系完善。2015年，我国促使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成果，这是近二十年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第一份货物贸易关税减让重大协定，参加方扩围产品的全球贸易额达1.3万亿美元，占相关产品全球贸易总额约90%，对提高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方面，稳步推进自贸关税谈判，落实自贸协定关税减让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9项自贸协定，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并且不断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税收政策，推进和深化多地保税区、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区关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但毋庸置言，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进一步跟踪国际市场变化积极发展外贸的同时，也需注重在必要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2020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支持出口转内销，包括搭建转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在符合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引导主要行业组织开展出口产品转内销专题活动，组织国内采购商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采购外贸产品。在与生产、流通、进出口、融资与结算服务相关的各个全球供应链环节上，我国的消除堵点需以高水平信息服务助力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为基础，引导外贸企业形极补链固链强链，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和工艺升级改造力度，形成供应链弹性和应变能力的更高水平状态。

必要的出口转为内销，需力求精准对接国内需求。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上，应引导外贸企业精准对接国内市场需求升级，发挥质量、研发等优势，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注重通过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研发适销对路的内销产品，并积极创建自有品牌、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应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政府需引导、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对出口产品转内销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结合实际开展内销贸易项下的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经营周转类信贷支持，积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仓单、订单等质押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

（五）加强战略性科技领域自主自强的创新攻关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力量，加强科技创新和攻关，才能在经济发展中提上“新经济”大潮和争取占领先机、赢得优势。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这些体现着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但同时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高度依赖进口，如高端芯片等，在美中贸易战后已被别人“卡脖子”。2020年11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始终把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纲举目张”的意义上，我国必须以改革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科技自主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指导精神，针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打通堵点，形成自立自强的内循环。

如高端芯片这样的“卡脖子”关键技术，已看得十分清楚，中国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要以举国体制的升级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这种“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借鉴过去研发“两弹一星”举国体制的宝贵经验，同时还必须以能够对接世界市场，经受全球竞争考验而形成超过临界点的可观市场份额，作为攻关成功的标志，最终将内循环与外循环对接。更为开阔地观察，我国每年钢铁年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作为制造业大国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一些特种钢材、高端航空发动机、超高精度机床、顶尖精密仪器，仍需要依靠进口，这些关键技术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门，只有建立在足够自主、安全的关键技术支撑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实打实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我国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的强有力统筹协调，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像高端芯片这样的攻关项目，应以举国之力组织协调至少数千个专业团队实施大兵团作战式攻关，协调枢纽环节要日日紧盯，直到达到攻关成功目标。为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方面加速突破应用，并积极对接世界市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

参考文献:

[1]贾康.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认识框架[J]. 金融经济,2020(12):3–8.

[2] 贾康. 加快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J]. 群言,2020(12):17–20.

[3]张立群. 坚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1):64–67.

[4]刘一伟,汪潮泳.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09):75–92.

[5]李迅雷. 从供给侧改革到需求侧改革——明年政策如何破题[N]. 华夏时报,2020–12–21(015).

[6]李春生.中国两个城镇化率之差的内涵、演变、原因及对策[J].城市问题,2018(01):11–16+25.

[7]潘腾.完善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J].国际公关,2020(09):10–11.

[8]李实,朱梦冰,詹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社会保障评论,2017,1(04):3–20.

略论管子“官天财”等新战略

■ 周怀宇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2021年2月9日，北京齐大战略研究院、《经济学家周刊》举办了视频会议，讨论管子的“大战略”。会议由北京齐大战略研究院院长曾益忻教授主持。周怀宇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视频发言。周怀宇教授讲了管子的三个问题，属于管子相齐的新战略。即：“官天财”是管子创造；“统计”是管子数据管理；“亲民”是管子激发生产力的发展的大政方针。

“官天财”是管子的新战略

何谓官天财？就是官府主导推行的开发天然资源，发展社会经济的方略。“天财”，就是天然资源所蕴藏的财富。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水平提高，很多原来没有能力开发的天然资源，可以在新的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得到广泛挖掘和开发，为社会增殖财富，藉以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管子《山国轨》篇，重点阐述了这个问题。“官天财”，出自《管子·山国轨》。管子围绕官天财方略，有很多深入浅出的论述。所谓官天财，即主张国家引导社会力量，扩大开发自然资源，为人类创造财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

管子“四端”开发与管理，即是官天财方略的具体部署，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要求。

1、开发“四端”

所谓“四端”，即是尚未开发的四种土地。管子经过全国土地调查，(参阅《地员》)有四种土地不能够种植粮食作物，闲置而成为荒芜土地。《管子·地员》篇记载，管子对全国土地实施了普查。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各种闲置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宝贵的天然资源，管子视为“天财”。其中可以开发并且能够带来天然财富的土地有四类，称之为“四端”；分别是：“莞蒲之壤”，“竹箭檀柘之壤”，“汜下渐洳之壤”，“水潦鱼鳖之壤。”

四端各有特点，可以依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开发，创造很高的经济价值。

第一类，“莞蒲之壤”，即是长满“莞蒲”水草的土地。“莞”，多年生草，茎高五六尺，纤而长。蒲，《说文》：“水草也 。”莞与蒲，两者皆可以织席。管子开发之后，莞蒲的使用价值一直在历史上传承。例如汉代，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汉书·东方朔传》：“莞蒲为席”，汉代史学家颜师古释曰：“莞，夫离也。今谓之葱蒲。以莞及蒲为席，亦尚质也。莞音完，又音官。”据《太平御览》卷709引《计然万物录》云：“六尺蒯席出河东，上价七十。蒲席出三辅，上价百。”又《居延汉简释文》391页：“三尺五寸蒲复席青布缘二直三百。”蒲席在汉时价值平均约值百钱至一百五十钱。莞蒲之壤，即富产莞蒲之地(参阅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第2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可见莞蒲之壤的开发，为齐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扩大了土地资源。

第二类，“竹箭檀柘之壤。”竹，即竹子。箭，亦竹之一种，高七八尺，叶大如箬，干细节修，质强韧，可作箭干。《文选·左思吴都赋·注》“箭竹细小而劲实，可以为箭。”檀，硬木。《诗·将仲子兮》：“无折我树檀。”朱熹注：“檀，皮青，滑泽，材强韧，可为车。”柘，《说文》：“桑属。”柘材坚劲，宜作弓。《周礼·考工记》：“弓人取干之道，柘为上。”又可以为弹。《西京杂记》：“长安五陵人以柘木为弹，真珠为丸，以弹鸟雀。”檀柘皆是贵重木材。《汉书·东方朔传》：“南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jīng,同“粳”，《玉篇》:秔稻。)稻梨果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蠝(wú,青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这些土壤，号“土膏”，誉其肥沃。都是可以开发的优良之壤。

第三类，“汜下渐洳之壤”，犹言污下多水之地。唐代房玄龄《管子注》“汜下”，即是污下潮湿的低洼地。《山至数》：“汜下多水。”这些土壤同样具有开发价值。

第四类，“水潦鱼鳖之壤。”这些土壤，是指生长鱼鳖的水潭地。开发水生养殖，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管子对于这四类土地，经济价值的评估很高，相当于“亩十鼓之壤。”房玄龄注：“鼓，十二斛也。”亩十鼓，谓每地一亩可产谷十鼓，即一百二十斛。

概言之，上述四壤，其经济利益可与亩产十鼓肥沃土壤相当，经济价值很高，开发意义很大。每一个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高低都有自身的客观历史进程，管子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发展，管子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粮食作物之外的土地资源开发战略，能够在闲置不能种植五谷的土地上，开发新的经济作物，惠及社会，惠及民生，无疑为百姓开拓了谋生的新途径，也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

“官天财”的精髓，就是探索自然资源的奥秘，寻找新的社会经济增长渠道，扩大社会经济的财富来源。管子相齐时期，不仅开发了四壤经济，也开发了山陵经济、海洋经济。冶金、铸铁、林木、煮盐、渔业以及相应手工业、商业乃至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得到较快的发展。

社会经济总体水平得到提高与发展，必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江淮地区“菁茅”之地的经济开发，改变了周王室的贫困，就是一证。

2、“三马”创造数据管理战略

管子创建了“数据”理论，内涵丰富，其具体标识有三：其一，确立了数据观，用数据眼光看世界，形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广泛联系的数据思想；其二，创建“轨数”论，提出了一系列数据新概念，阐明了这些新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数据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各种事物所包含的数字规律；其三，引用“轨数”论，制定各种数据方略，运筹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均地分力”“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改革，社会变革亦悄然发生在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

计算也；“数”，术也，亦即应用也。当时历史条件下，管子提出了这类“数据”战略，距今27个世纪，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早的数据思维！数据统计，需要两个条件：先进的数学方法，灵活的社会应用，二者结合，形成一门专门的数据学术。下面重点说说，管子在数据应用方面的战略艺术。

官天财，是管子数据管理中比较成功的方面。通过数据管理，指导了四壤如何开发，把四壤收获物的价格和税收挂钩，这样有利于调动富余劳动人口的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国家通过赋税收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满足边防与军备的需要，而又不增加民众的额外负担，管子依据这一学术创造，大胆提出“不着于民”而完成军备，即不需要增加税收而解决财政方面的军费开支。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社会举措，也是十分进步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是通过数据管理完成的。

3、管子“亲民”的新国策

管子相齐，提出“亲民”主张。管子“亲民”的核心思想，即确立新的“民众”，即亲民的范围扩大了，不再局限于统治阶层中间的广大民众，而是全社会的民众。这一主张，是破天荒的新思想，凡此之前历史文献未见记载。管子藉此改变夏商周以来的君民关系，把“民”的范围扩大社会基层的体力劳动者。这样做，不仅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也改变了生产关系，所有社会上体力劳动者都成为支撑国家的社会生产力。

管子亲民思想，在齐国实施之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基层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物质财富，齐国国力迅速发展，由弱变富，由富转强。

管子亲民思想的相关论述，集中在《六亲五法》中。这是《管子》中的名篇。导召“亲民”，是鲜明的主题。

《六亲五法》中，所谓“六亲”，非人伦关系之“六亲”，即非父母、夫妇、兄弟之六种伦理关系，也不是阶层等级的定义，而是六种不同维度的“亲民”思想，强调了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亲属、非亲属、同乡、非同乡、本国国民、或者来自别国的非本国国民，都要消除隔阂，友善相处，一律平等，不分亲疏，普天之下，“何私何亲”！管子倡导和实施“何私何亲”即无私无亲、不分亲疏的全民关系，包含君民关系，根本目的是调动全社会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增值财富，他《六亲五法》中阐述其理论思维，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动机在于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增值财富。

《六亲五法》，属于《管子》第一章《牧民》中的重要一篇。《牧民》这一章的中心思想，就是重新认识人民，树立新的“亲民”观念。全章一共下设四个篇章：《牧民》《四维》《七经》《六亲》。全部围绕“亲民”主题展开阐述，依次表现为五个方面内容：重点是摆正君民位置、构建新的国民地位，强调统治阶层应当顺从民心，围绕国民的愿望做好各种事情，这就是管子的管理方略，称之为“牧民”。

第一部分，《牧民》，中心内容，描述了一个新型模式的国家架构，为这个架构构建了管理人民的主题。这是前此奴隶社会的人民观。新的人民观，强调了土地的重要性。人民，离不开土地，需要建置官员，包含构建相应的刑罚。保证人民在这个框架中是主体地位。

第二部分，“四维”，提出意识形态的改造，遴选传统价值观中四个主要元素“礼义廉耻”，进行新的阐述。管子推陈出新的主要内容，将这四种价值观推向全社会，不同于过去，仅仅限制在统治阶层。要求全社会成员享受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塑造全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第三部分，“四顺”。主旨是顺从民心，帮助人民实现美好愿望。精准提出了人民关注的四个重要问题：“恶忧劳”、“恶兹贱”、“恶危坠”、“恶灭绝”。这是管子时期的社会民情，具有时代性的客观总结。掌握了这一民情，对症下药，顺应民情，提出解决问题的“四顺”举措，帮助人民“佚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这四件大事逐步实现，藉以凝拢人心，赢得民心，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部分，“七经”。主要内容，依据民众的期盼，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11件大事，作为国家和各级官府主要任务。这11件大事，关系国计民生。

1、率领国民造好国都，“错国于不倾之地。”

2、储存粮食，“积于不测之仓”，保证百姓的“饭碗”工程。

3、积累财富，“藏于不竭之府”，建立富强的社会。

4、在事态萌发的时候制定政策，“下令于流水之原”。

5、稳定社会，便民生产生活，“便民于不争之官”。

6、严明法律，“明必死之路”，实行法治。

7、赏罚分明，“开必得之门”，鼓励人民。

8、实事求是，衡量民力，“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度。”

9、选拔人才，聊士大夫各种岗位，“授有德”之人。

10、发展农业生产，“务五谷”种植。

11、发展“养桑麻、育六畜”事业。

第五部分，“六亲五法”。站在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阐明如何“亲民”！包含一家、一乡、一国(指诸侯国)、全天下(指周王朝)、日月所照耀的地方，即是包含周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区域。管子主张所有人都要一视同仁。“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不同范围，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不能够局限某一种情感。

这五个结构，贯穿一个主题，即亲民，团结民众。从“国颂”“四维”“四顺”“十经”“六亲五法”，亲民思想，一以贯之。

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于选任管理人民的官员。管子在《六亲五法》中详细阐述，“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这是管子确立的新的选才任人的标准，其条件是互为补充的。基本特色在于避开了血缘血统的世袭制观念，依据各个岗位的客观要求选贤任能，任任各级各方面政府官员。这是非常宝贵的思想，动摇了原有的世袭制的官僚大厦。

管子认为：牧民，就是管理。管理人民，从亲民开始。民众要什么？满足民众的要求，就是牧民的根本宗旨。

齐国新政——“超级工程”震古烁今

■ 龚武

周朝天下的形势与周朝初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权威不再，成为“稻草人”。一些中原地区之外的大国逐渐做大做强，东夷诸国明显式微，东北和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侵扰加剧。一方面，中原之地，天时地利与人和，自古而然。守成之国，总是希望别动“我的蛋糕”；一方面，中原块块大国，“奉天承运”以天子之名，希望“有所作为”成为“国际宪兵”；更有城外夷狄之邦，信心满满，不惜疲而走险火中取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管子审时度势辅佐齐桓公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或“复灭继绝”率先垂范，或“征战讨伐”以资教训，或“不以兵车”遏会结盟，或止分罢争和平共处，或联合列国，抗击外侮。经过几十年努力，管子辅佐齐桓公逐渐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齐国最终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由于齐国几任国君犯有内政和外交一手软一手硬的通病，内政不治，而借助以大败小的所谓“小霸”局面来掩盖官员腐败、纲纪松弛，政令不通、经济凋敝、民生维艰的乱象。齐国要兴修霸业充当“国际宪兵”，保卫周天子，平息列国纷争，就需要“打铁还得自身硬”，把齐国的事情办好。管子改革弊政，推行新政，涉及一揽子治理齐国的